

上海之蝉

杨晓红

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深切感觉人如蝼蚁。上海街头的人们，尤其那些年轻人，都在匆忙奔走。他们有着我所不知的前程和生活。城市的空间极其拥挤，又极其巨大。感觉有一个看不见的、高高在上的巨手掌控着城市的动脉，那无处不在的神经，神秘恢弘，而又秩序井然。在这巨大而滚动的空间里，我可以触摸到的是无休止的颤动，一切都与我无关，我连一粒尘埃都不是。

一年一度的暑假，从一个热腾腾的小城，奔来这热浪滚滚的大上海，我的目的就是——一个，与女儿团聚。在这大都市的一隅，做个暂栖的公民，关起门来一家人就是个完整的世界。我的世界蝼蚁般渺小。每天除了菜市场就是小公园。走在街上，悠闲的脚步表明我是个十足的闲人。除了看人，就看汽车。记得二三十年来上海，那时候人和自行车比乡下的庄稼还多，不同的是庄稼不会流动。如今的上海车比人多，那车都长着眼睛，朝着既定的目标奔驰。再看窗户。因为人不在车里，就在房子里，窗户是房子的眼睛。我很想了解那“眼睛”后的生活，是否与我有不同。许多窗户都掩映在树木后面，陌生而防范的，我无法窥探更多内容。而像陆家嘴的上海中心、环球金融中心这样摩天大楼里，屏幕上一串数字的颤动，或许就能引起全球金融局势的动荡。那些晶莹剔透极具象形的楼宇，像一些高高在上、睥睨一切的大神，就连燕鸷们也无法企及，又岂是我能够得着的风景。幸好有树木可以尽情仰视。鸟鸣和我一样是多余的。知了也是卑微的闲鸟。大热的天，尤其中午、傍晚，它们叫得最响。叫声不知道于哪一天突然扑进我的窗户，乍一听，如久违了的乡言村语，有他乡遇故旧之感。它们就那样努力地叫，我也在认真地听。感觉它们在钢铁水泥的空隙里，那些敦厚的树木之上，建立了一个听得见却看不到的乡村。

有几天出门，总要看一些知了。它们紧闭着黑色的唇吻，收拢着薄而透明的羽翼，或仰或俯，在行道树下，分明死了的。那结实的胸腹，是已经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任务，寿终正寝，还是热死，或者整日聒噪，累死的？我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们生活上海比生活在其他地方，比如那个我经常去住的小山村，要具有更大的空间适应能力和抗热的耐力。

人有多聪明，知道哪儿凉，往哪儿躲。更加聪明的是城市人，制造那么聪明的机器，自己躲在机器制造的一小片阴凉里，把更多热量散发到水泥包裹以外，给树木，给飞鸟蝉虫。而蝉似乎是最不懂得避暑躲荫的生物，风来，它们跟着树摇一摇，雨过，它们顺着树干爬一爬。热了，它们叫，凉了，它们还叫。它们不会吃掉叶子，也不会啃坏树皮，仿佛就只是酷烈盛夏的祭品。

蝉是夏天的一部分。小时候经常会从田间地头捡到将死的蝉，甚至爬到树干上捉到正叫得欢的活蝉，把它们关进火柴盒里嘶鸣。却不知道它们却也有着传奇的一生。蝉的一生从树上开始，一被父母生出来，就懂得借风雨之力从高高的树枝上落到地面，钻进土层并藏身其中，经过多年的深埋，再于某一个夏日，挣脱捆绑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黑暗地宫，钻出地面，再次爬上高高的树干，蜕下泥壳，露出透明的羽翼。等待它们的将是一种短暂而炽热的赴死之途。燥热的空气启动了它身体里蛰伏的生命密码，爱情的欲望觉醒了，于是，它高歌，它呼唤，意中的新娘是个聋子，和它一样刚刚苏醒。于是有的蝉幸运地找到了另一半，留下几千

个念想。而这些念想，最终有几个能够完成钻入深土，多年后又再次安全出土呢。而最终出土的蝉，它们中的大多数终其一生的隐忍和聒噪，也只能孤独来孤独去。

有人说蝉从土里出来只能活七天，活到第八天的蝉，能见到其他蝉不能见到的风景和事物，也隐喻着，第八日的蝉，必定也要遭受不一样的苦旅。蝉能忍受的气温不能超过四十摄氏度。活到了第八日，是它的悲哀还是幸运，这种理由无从察觉。可以想象的是，上海的蝉，会看见很多乡下的蝉看不到的东西。比如那么多的汽车和人，那么高的楼房和高架桥。蝉不管这些，它们有自己坚定的使命。不能不令人惊叹，在上海，即使是居民小区，能有几寸没有硬化的土地。既然落在这片硬邦邦的土地上，那就得拿出硬邦邦的勇气和力气，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爬，爬，爬到那够得着爱情的高度，奋力鸣叫。

不管在哪听见蝉鸣蛙鼓，就想起婆婆的小山村。山村的窗户，是那种温和而怯怯的，给蝉，给一切过路者敞开，像一些无声的问候。在那里，一只公鸡就能叫响整个村子的黎明，一朵野菊花就是整个山林的骄女。它们的日子就在脚下，从不慌忙移动。在这里，日子很慢，一切都被慢调放大，哪怕是一声咳嗽，也那么郑重其事。一到夏天的午后，一切安静都交给蝉们，它们用毕生的力气，嘶喊着属于它们的爱情。那一刻，山村还原于古老的秩序。山村的蝉也会死，但你看不到。它们远离文明的宰割，会静静睡在露珠滴落的草木间，最后再次安宁入土。

文明要付出代价，文明是值得追求的，人就是为追求文明而牺牲自己的一只只蝉。蝉不会忘记自己生命的终极目的，我们人也不止是旁观者。鲁迅说过，大狗小狗都要叫。叫是宿命，也是使命，是生命的奥妙。世界上许多的叫声带来欲望，爱情，新生。虫鸟在叫声里活并延续，自然在叫声里生动而多彩，人在叫声里变化、进步。如果有一天这尘世没有了叫声，世界就寂灭了。

我们人也各有一方软硬不同的土地，每个人，每一只蝉都必须努力爬上树枝，努力地叫。我的女儿是一只正在努力爬上树枝，努力鸣叫的小小蝉。在上海这样坚硬的土地上不知道还有多少像女儿一样努力攀爬的“蝉”们。

小小的蝉是自然界最具生命力的物种之一。在中国古代文化里，蝉还代表轮回再生的寓意，帝王贵族在他们死后，常要在口中含一只玉蝉入土，祈愿重生。那正是蝉不怕深埋，从黑暗走向光明破土鸣声的能耐证明。没这两把刷子，怎么能够千万年延续古化石般的存在。

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。而相对于蝉来说人无疑是所向无敌的强者。恃强凌弱，是我们人类常干的事。蝉鸟们的生活充满凶险，地球上许多的美好生物都在人无所不能的魔掌下消失了。每一次见到它们的身影或听到它们的声音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时常见到一棵大树，一片竹林，或一溜街树被斩杀，那些随之而居的虫鸟豕兔随即被搅扰，被践踏丧生。没有呼喊，没有悲伤，甚至没有留下痕迹。只有大地慈悲地接纳了它们的尸骸。

我感恩，造物主让我生而为人，居于万物灵长的幸运，同时我惶恐，我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。愿持一颗悲悯之心，在大地宽厚仁慈的胸怀中，与生灵万类友善共存，于这多彩又艰辛的世界。



采秋

张成林

摄

三哥的字

舒敬东

先父半生务农，骨里却依然是书生。即便肩扛手提，在田间劳作，也难掩儒雅之气。徽州旧俗，“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。”父亲年少失怙，更是难逃此厄。在谋食的间隙，父亲自学了算盘、书法、绘画等等技艺。父亲去世后，妹妹曾说三哥承袭了父亲的书法技艺。我倒是迷过绘画，尚未起步，便颓然作罢。我们兄妹六人，真正继承先父衣钵的，唯有三哥。

老宅楼上被虫蛀满了圆洞的医书，早都被大哥搬了去。大哥学医，兄妹几人也只有他懂得祖上留下的这些“破烂”的价值；先父视如珍宝的各式字帖，在世时，便陆陆续续地将它们交给了三哥。三哥就靠这些字帖打发了难得的空闲。当初，我也曾有过习帖的念头，但转而一想，就那几笔，整日里划来划去，实在是枯燥乏味，倒不如看书习作有趣味。

三哥也看书，我见得多的却是他独处一室，静静地临帖。

三哥向来就比我忙，也比我累。我不管好歹，尚有一份较稳定的营生，沿袭过去的言辞，我有“皇粮”可吃，一路走来，虽说难富难贵，却也不慌不急；三哥则不同，为了养家活口，他走马灯似的换营生，什么来钱就使什么：种田、养蚕、赶马、贩瓜、卖茶、浇“平顶”，还放过电影。如今，则做起旅游民宿营生，生活富足的同时，精神世界也愈加充实丰硕了：法书是越来越耐看。这一步步走来的几十年里，有一个姿

势，他始终未变：手执毛笔，静静地临帖。终将一件最没意思的事弄得特有意思，顺带还使自己成了当地的书协会员。法书亦由门侧作对联升入厅堂作点缀、作装饰，能换货币了；就连来旅游的美院教授也倍加赞赏，欲与之强强联手，打造书画精品。

这是他始料未及的，也是我们所未想到的。

我敬佩他的，不是他的法书现在有多好，成就有多大，而是这几十年的不离不弃的坚守。于他而言，与其说是坚守，莫如说是痴迷。就如同我一闲下来就捧书，他一静下来就执笔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俩还真是兄弟。他以此的方式延续了父亲的生命，我则以自己方式恢复了父亲的书生底色。

父亲颜体法书，雍容大度，一如其举止，这是三哥所不及的。三哥守得住，但放有不足，不够大气。最直观的比照，父亲写对联，喜用排笔，大气喜庆；三哥则始终用狼毫，刚正纤细，一如小家碧玉。

三哥胜也胜在小。他的小楷，在当地罕有其匹，人见人爱。我从他的小楷里，看到了父亲的为人：一板一眼，谨严工整，恪守法度。

三哥用他的楷书复活了父亲！

父亲行事，一生谨严，举止却儒雅大度，一看就是个有阅历有修养之人，前半生的经历在他的后半生一点一滴地渗透了出来；三哥却正相反，行事大胆，法书却谨严，不逾法度。

父子相照，煞是有趣。